

而尧布衣掩形，鹿裘御寒。’皆以‘鹿裘’为‘麤裘’。”

杨先生所举的例子似乎并不能证明“鹿裘”即“麤裘”，也就是“鹿”是“麤”的省略写法。笔者也没见到将“麤”省写作“鹿”的确证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“鹿裘衡、长、祛。”孔颖达疏：“鹿裘者，亦小祥后也，为冬时吉凶衣，里皆有裘。吉时则贵贱有异，丧时则同用大鹿皮为之。鹿色近白，与丧相宜也。”

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“尧之王天下也……冬日麤裘，夏日葛衣。”此条与杨先生所举的《六韬》、《淮南子》的例子可以共证明有帝尧着鹿皮裘的说法，并非粗（麤）裘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教育学院

马融追杀郑玄说质疑

冯浩菲

马融、郑玄是东汉时期两位著名的经学家和文献学家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《后汉书》有传。但是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篇开头却载有一段关于马融追杀他的弟子郑玄的希奇古怪的故事。全文如下：

郑玄在马融门下，三年不得相见，高足弟子传授而已。尝算浑天不合，诸弟子莫能解；或言玄能者，融召令算，一转便决，众咸骇服。及玄业成辞归，既而融有“礼乐皆东”之叹，恐玄擅名而心忌焉。玄亦疑有追，乃坐桥下，在水上据屐。融果转式逐之，告左右曰：“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，此必死矣。”遂罢追。玄竟以得免。

根据这个故事，一代通儒大师马融竟成了忌才害能的屑屑小人。果真如此，马融其人就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。因此这个故事是真是假，关系不小，跟一般的遗闻轶事不同。对此，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：一种否定，一种肯定。否定者以刘孝标为代表，刘氏注《世说新语》，在上文所引那段故事末尾注道：

马融，海内大儒，被服仁义；郑玄名列门人，亲传其业，何猜忌而行鸩毒乎？委巷之言，贼夫人之子。

即认为马融是海内大儒，决不会象庸夫妒妇一样忌害自己的弟子，《文学》篇的故事属于里巷妄言，是对马氏的中伤。

肯定者以东莱侯登岸为代表，他于清道光年间撰定《汉大司农康成郑公年谱》，在《附轶事》一目下，转述了上文所引《世说新语》那段故事，并加案语说：

此条《世说》注驳之，谓马融海内名儒，被服仁义，必无此事。愚谓马融乃得罪名教之人，安得云被服仁义？此事或有之，不必为之辩。

即认为马融得罪名教，行为不检；追杀郑玄的事，可能属实。

这样，关于马融追杀郑玄的传说，或信其无，或信其有，便成了千古疑案，莫可究诘。我们认为，这桩公案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年来年，文献不足，确实难以论断。尽管如此，但可疑之处仍然不少，今质其所疑，公之于众，或许有助于澄清事实真相。

第一，因弟子学有所长，宗师忌其才而追杀，不合情理。

《后汉书·马融列传》谓“融才高博洽，为世通儒，教养诸生，常有千数。”说明马融为当时通儒名师，众所敬仰，而郑玄是他的门弟子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乃是常情。弟子学有所长，可以卓然名家，水涨船高，正表明业师非凡，教育有方，师徒两美，相得益彰。即所谓母以子贵，师以徒显，做宗师的怎么会害怕徒弟擅名而起忌恨之心呢？《后汉书·郑玄列传》记述郑玄学成辞归的情况时有云：“融喟然谓门人曰：‘郑生今去，吾道东矣！。’”

正表明马氏当时既惋惜，又自豪的心情，没有任何忌恨的迹象。之所以惋惜，是因为郑玄在他门下三年，常由高业弟子传授，他对郑玄的才能发现得太晚，未能及时升进，故不免喟然而叹。之所以自豪，是因为虽然他平日没有升进礼待郑玄，但郑玄毕竟出于他的门下，才学出众，回到东方，对他的学说必能发扬光大，因此也感到快慰。这种既惋惜，又自豪的心情，正符合他这位通儒名师的心境。可见《郑玄列传》的记载是合情理的。相比之下，《世说新语》在记述郑玄学成辞归时比正史中的记载多出的那段衍说，即马融因忌才而追杀郑玄的故事，显得希奇古怪，不合情理。

第二，追杀门弟子的行为，也跟马融的为人品性格格不入。据范书《马融列传》载，马氏出于官宦世家，学无常师，博通经籍，胸有大略。一生经历坎坷，不甘心受制于豪门势家。梁冀专权时，为议郎，在东观著述，以病去官，开门授徒。为人美辞貌，“达生任性，不拘儒者之节。居宇器服，多存侈饰。常坐高堂，施绛纱帐，前授生徒，后列女乐，弟子以次相传，鲜有人其室者。”说明生活放浪，不拘小节，即所谓“得罪名教”。可见他豪爽，超脱，不是那般斤斤计较名利得失的角色。人的一言一行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性格特征的制约。因此，象马融那样的名师大儒，说郑玄受业于门下，三年不得见，那是可能的；但是如果说他害怕郑玄擅名而妒忌，乃至于率领众门徒去追杀，那却极不可能，近于鬼话。因为一则像他那样豪爽、超脱的大儒不会那样想，那样做。（只有象隗嚣、梁冀那样的政客才有可能那样想，那样做。）二则马氏在郑玄受业于门下之前，早有大名于天下，而且弟子出名并不会影响宗师的地位，更何况马氏本人名利之心恬淡，无由忌才杀生。三则如果因为一个弟子有卓异才能，心中容不下，便率领众弟子去追杀，难道不怕众弟子因为嫌他忌才害能而背离吗？那样一来，岂不是以小失大，名声更坏吗？那

种笨事，连有一般见识的人也不会去干。《世说》中竟然谓一代大儒马融那样做了，岂不可笑！

第三，追杀之事正史不载，别传不记，说明属于无中生有，不可信据。范氏《后汉书·郑玄列传》记载郑氏师事马氏时云：

“以山东无足问者，乃西入关，因涿郡卢植，事扶风马融。融门徒四百余人，升堂进者五十余生。融素骄贵，玄在门下，三年不得见，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。玄日夜寻诵，未尝怠倦。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，闻玄善算，乃召见于楼上，玄因从质诸疑义，问毕辞归。融喟然谓门人曰：‘郑生今去，吾道东矣！’”只此而已，别无它说，根本没有马融嫉妒郑玄的才能，乃至于追杀他的事情。《郑玄别传》的记载与范书大同小异，也没有忌才追杀的事情。《后汉书·马融列传》则只谓“涿郡卢植、北海郑玄，皆其徒也”，再没有言及与郑玄的关系。

如果马融真有忌才害能率众追杀弟子郑玄的事情，那就是大关节，而且世人皆知，因此《后汉书》、《郑玄别传》等，必然都要记载。既然正史不载，别传不记，汉魏晋宋其它文献也无录，那就清楚地表明，所谓马融追杀郑玄的传说，纯粹属于无中生有，瞎编乱造。

郑玄师事马融是公元152年前后的事情，而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《世说新语》大约在公元440年左右，中间相去近三百年光景，刘氏无由亲知其事，乃系揣摩风声，记其遗闻，难免失真，故此事不可信据。

第四，《世说新语》对马、郑师徒关系的记载（见本文开头所引），从“郑玄在马融门下”到“有‘礼乐皆东’之叹”，基本上依循前代旧说，故与范书《郑玄列传》所载大体相同。从“恐玄擅名而心忌焉”到末尾，叙述马融追杀郑玄一事，系后人生发编造，故荒唐不稽。写郑玄行路间疑有追杀之人，蜷局着躲在桥下水上，一幅可怜相，全然没有出于名门，学成而归的学者

的气派。写马融则更加离奇，率领徒众，拿着占卜器，一边占算，一边追赶，而且占算得准确无误，算定郑玄必死，方命收兵。既似诸葛，不似诸葛；既似曹操，不似曹操，活生生一幅恶棍加算命先生的样子，哪里有一点点通儒名师的影子？明眼人一看，就知道这是无聊之徒不负责任的编造。难怪隋唐而下，凡严肃的作者，正经的书籍，都不收录这段“遗闻轶事”。

根据以上推论，我们认为《世说新语》中关于马融追杀郑玄的一段记述，属于捕风捉影，虚生枝节。当初编造这段故事的人，出于对郑玄的景慕，为了把他描述得更加神乎，便根据郑玄帮助他的老师马融推算图纬问题的传说，加以生发：首先谓马融和别的弟子都不能解决的问题，被郑玄一下子解决了，衬托出郑玄的算学不但高于马门高业弟子，而且高于他的老师。继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以为徒弟高明，宗师妒忌，于是编造出马融追杀郑玄的故事，流传于民间，辗转生发，终于被刘义庆当作遗闻轶事收入《世说新语》，遂使通儒名师马融蒙不白之冤。南梁刘孝标生年与刘义庆紧相接，所注《世说新语》对此加以驳斥，说明时人对这段离奇的故事已经不相信。

这件事引出了一条教训：凡文艺作品中对历史人物的描写，应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加以必要的夸饰，但不能离题太远，尤其不应该随意枉加罪名。今天的刑罚中有因诽谤陷害而致罪的条款，对历史人物也不能诬陷。否则，诬古误今，搅乱历史，失去真实性，多么美妙的艺术，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还有，今人谁愿意让自己的祖宗被艺术家任意加上一种可耻的罪名呢？将心比，都一理。因此从人伦感情的角度而言，也不应该为了追求艺术而导致诬古误今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